

论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之性别优势的多维性

左兴玲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女权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实现女性和男性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权力平等,但由于长期受男权主义观念的影响,女性性别优势难以充分彰显。要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参与权和决策权,就必须对女性的性别优势作合理的挖掘。从性别分析方法入手,对情感与理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进行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女性在心理、情感、认知等性别优势的多维度表现,将有助于她们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公共管理和决策中。

关键词:管理和决策;性别优势;关怀伦理学;女性主义立场论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7)04-0015-07

女性主义对导致男女两性不平等的制度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其中,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的主要方法之一,本研究以此方法入手,对情感与理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重新建立情感与理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内涵,目的在于阐明女性有深入参与社会管理和决策的能力。

一、性别分析方法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思

二元对立思维普遍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中,这种以父权制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对情感与理智、文化与自然、光明与黑暗、主动与被动等统一体作出了价值二元对立的主观评价。这种思维模式将女性所具有的性别属性视为消极、被动的存在。例如,中国儒家文化从汉代开始明确形成了“男尊

女卑”的观念,董仲舒认为“男为阳,女为阴”,阳是尊贵的,阴是卑贱的,阳为阴之主,阴为阳之助,所以“妻要受命于夫”^[1]。在西方文化中,早在古希腊时期,随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高度赞扬,理性的王国就被确立起来。但高扬理性却是以贬低感性和情感为代价的,而被感性化的女性自然也就在贬抑之列。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有一个善的本原,它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还有一个恶的本原,它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2]。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总是提供物质材料,男人总是塑造它……身体来自于女性,而灵魂来自于男性^{[3] [P22-23]}。自此,男人和女人被看作是同光明与黑暗一样的二元对立关系,男人与所有主动的、文化的、光明的或一般来说正面的事物相联系,而女人则与所有被动的、自然的、黑暗的或一般

收稿日期: 2017-04-27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20720161047); 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培训基地繁荣计划项目“实验哲学视野下的(两岸)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研究”(项目编号: FJ201403)

作者简介: 左兴玲(1985—),女,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女性主义哲学研究。

来说负面的事物相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固化了男人与女人截然不同的“本质”,而且对西方人的认知影响深远,即便是在今天也能寻觅到它的踪影。

在二元对立的范畴中,最能固化男人和女人本质的,当属“情感与理智”,这种本质论认为女人是感性的,缺少理智的,男人则是以理智为主的。男女两性不同的本质规定决定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性别分属以及社会地位的高低。柏拉图认为“男人的美德是管理国家,女人的美德是‘治理家庭、料理家务和服从丈夫’”^{[3] P36)}。亚里士多德将家庭和城邦作了区分,认为家庭的目的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而城邦则超越了“单纯生活”的需要,它是为“善的生活”而存在的,单纯的自然需要存在于家庭为主的生活领域,这一领域又受自由男人的统治,因为女性拥有不完善的理性能力,而男性则有更全面和更完善的道德美德与理性^{[3] P39-40)}。因此,在古希腊时期,只有男性拥有决定国家社会发展的权利,女性则被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连基本的公民权利都没有。由于性别差异,男女两性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工古已有之,但在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中,男性分属公共领域,国家和市场管理等公共领域都为男性所控制,并被赋予很高的价值;女性则分属私人领域,家庭、情感生活被视为女性活动的私人领域,被赋予极低的价值。

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这种否定性理解将女性完全从公共领域中排除出去,阻断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途径。因此,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情感与理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相互对立,才能根除限制女性公共参与的障碍。

众所周知,“性别关系”是人类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个人身份的性别认同,对性别作专门的理论研究在古代社会几无可能,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才开启了这一重要的理论领域。如今,性别研究已发展成一种性别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考察人们的认识和行动时,要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尤其在社会制度和层面,更需充分考虑到每一个独立个体(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特殊需要,使其在社会中获得

合理发展的权利。

基于此,性别分析方法对情感与理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持一种批判态度。二元对立思维在男权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中,一直主导着对女性性别的歧视性规定,性别分析方法则从理论和现实上,力图证明女性和男性的性别差异并无优劣之分,而且贬抑情感、高扬理性等等,都是文化偏见所导致的不合理的观念。理智和情感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独特价值,它是人性的一体两面,既没有绝对的理性人,也没有绝对的感性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虽然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的表现各有轻重,但绝不是像光明和黑暗那样的二元对立,而是互有优劣、相互补充的关系。传统文化将女性的情感因素视为女人的缺陷,将男性的理性因素看作是智慧的象征,以此贬低女性、高扬男性本身只能被视为一种文化的偏见。

此外,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将男性分属公共领域和女性分属私人领域,这也是文化偏见的产物。公共领域将女性排除在外,并被赋予比私人领域更高的社会价值,进而通过性别隔离的方式使女性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女性公共参与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要打破这种公私领域的对立与性别隔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不应该有明确的价值区分,它们的划分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相互渗透的。在女性主义看来,虽然家庭被划归为私人领域,但女性的生育和养育子女、家务劳动以及对家人的情感付出都应该被视为社会生产,它像公共空间的经济生产一样是人类整体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没有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没有女性在家庭等私人领域的特殊贡献,经济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生产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精神生产等等的统一,传统的家庭私人领域则是这些生产活动的重要因素。随着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逐渐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公私领域的二元对立。然而,女性在公共参与上依旧处于劣势地位,为了更好地说明女性参与公共管理和决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必要彰显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并将这种优势与女

性在家庭和情感方面的优势合理地统一起来,这就需要女性的性别优势作系统深入的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的证明。

二、女性公共参与的性别优势

女性因为性别差异而独具某些优点,使其在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出一定的性别优势。性别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生理性别造就了男女两性不同的身体构造,社会性别以生理性别为基础,通过文化形成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气质。简言之,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心理、情感和认知上都呈现出一些独特的性别优势。

(一) 女性的心理优势

从现代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来看,男女两性在智能方面总体上大致相当,但在智能结构方面则各具特色,具体表现有“在语言能力上,女性显示出较明显的优势;在记忆方面,男性比女性善于意义和逻辑加工;在思维方面,女性的思维倾向于形象性,男性的思维则更具抽象性;在感知觉方面,女性要比男性敏感,知觉速度也比男性快,在反应速度上则是男性更快一些”^{[4] (P227)}。可见,在记忆和思维方面男女两性平分秋色,各有特点,而在语言和感知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具优势。具体而言,女性在这两方面的优势造成了其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细致的观察力。

首先,女性的语言优势使其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对大脑功能区域化的研究表明,男性主要运用左脑进行交谈,女性则运用左右两侧大脑;口吃也被认为与口吃者的言语和语言的脑功能异常相关,而在口吃患者中,男性的比例远高于女性。这些科学证据都表明,女性发展出较为明显的语言优势,表现为语言流畅、形象、表达力强,这种优势在幼儿期、青春期及其以后的发展阶段中都占有突出地位^{[4] (P225)}。正因为具备这样的语言优势,女性表现出良好的沟通能力,并且善于运用沟通来寻求合作和解决问题。这种语言优势使女性在社会公共管理和决策,尤其是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必然会显示出独有的优势。

其次,心理学研究证明:女性敏感性高,具有细致的观察力。以优异的感知力为基础,女性善于捕捉身体语言、口头信号、音调,以及其他感觉

刺激中的微小信息。“对身体语言的研究表明,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有60%~80%的信息是非语言信号传递的,语言信号只占20%~30%,另外7%~10%是语汇。女性能敏感地收集分析信息,她们两个大脑半球之间信息的迅速传递,使她们精于理解这些语言和视觉的信号”^{[5] (P254)}。此外,很多女性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意识,能敏锐地洞察和感知人和事物,这种意识通常被称作第六感觉,“这种下意识的直接感觉不是掺杂观察思考和理性分析的结果,它产生于一种不可理喻的反应而隐约感知……第六感虽然不属于五官感觉,但却与之息息相关。可以说,它是相对意义上的超视波、超嗅波、超触波,这些浅波作用于潜意识,以其敏感和善藏,成为五官五觉的微妙补充”^{[5] (P254)}。女性敏感性高使其对一些微小事物也能有所觉察,进而具有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因此,女性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能够做得更好,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女人“心细”。这种细致的洞察力使女性在公共参与中,尤其是在“细节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更具有决策优势。例如,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女性领导者的成功即可以说明这一点。海尔集团副总裁杨绵绵“一根头发丝”的故事,被看作是管理学的经典案例:一次,她在分厂检查产品质量,在一台冰箱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根头发丝,便立即召开会议,有的职工觉得她小题大做,但她却严肃地说“抓质量就是要连一根头发丝也不放过”。这种认真细致的态度,促使企业严把质量关,对企业发展大有裨益。

除了心理方面的优势,女性所独有的情感优势,也使得她们能够更敏感地体察到人际交往中所包含的各种复杂而细腻的情感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她们表现出更强的情感协调能力,使人与人在公共领域的交往中更富有人情味、更具和谐气氛,而这正是良好的社会管理所应该具有的情感基础。

(二) 基于关怀伦理的情感优势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情感的丰富往往被曲解为缺乏理智的表现,但科学证明,女性丰富的情感表达和超越男性的感知能力,却是女性特有的优势。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所建构的关怀伦理学,比较充分地彰显了女性的这种优势。关怀伦理

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情感、关系,是一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同情和相互交流,从而形成协调的关系网络的伦理理论^{[6] P27)}。

关怀伦理学的奠基者吉利根,在其代表作《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中论述了女性的自我和道德发展问题。她认为,女性在道德发展上有着“不同的声音”,它反映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道德冲突所采取的解决方式和过程。吉利根通过访谈和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男性的道德以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为基础,强调人的自主性和权利,以此发展出来的是一种公正伦理;女性的道德则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彼此负有责任的意识,进而发展出一种关怀伦理。女性把道德看作一个关系网络,把道德选择和判断看作是关系中的理解和对话,而不是彼此之间的否定和冲突。女性更强调“关系”“联系”,将道德中的情感关系看成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强调彼此之间责任的共同承担,尽可能弱化责任推诿,使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更富有人情味、更容易互相理解。这种以关怀为基础的、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方式,比以理性为基础的公正伦理更具有沟通上的有效性。

关怀伦理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诺丁斯,对关怀在关系行为中所具有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入的考察。在她看来,关怀是一种关系行为,这种关系的发生和维系取决于关怀方和被关怀方彼此之间的互动,她说“关怀实际上是人们在身心上对他人或他物所承担的责任,是关怀方把握他人的现实性,尽可能地满足他人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的,并能够得到被关怀方回应的一种关系行为”^{[6] P45)}。进一步说,关怀方在关怀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并在关怀行为中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关怀方会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人身上,与他人发生一种“移情”作用,并把他人接受为自己,同他人一起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母亲感知自己的婴儿一样那么自然而深刻。其次,关怀的范围有内外圈之分。关怀方“总能将自己置于关怀圈的中心。从内圈看,她之所以关怀是因为爱。但当关怀方走向并没有从家庭而

来的自然需要的外圈时,关怀方还是发现自己具有行为准则,关怀方必须使自己的爱具有超越性,让外圈的人作为潜在的被关怀者进入自己的关怀圈”^{[6] P46)}。再次,关怀方在关怀关系中形成了自我,关怀方不仅把自己看作关怀方,也把自己想做被关怀方,渴望被理解、被接受,从而形成伦理自我,“这个伦理自我来源于对联系的承认,包括自我与他人的自然联系,以及通过他人与自我的联系而与自我重新建立起来的联系,当关怀方关怀他人和被他人关怀时,她也能关怀自我”^{[6] P25)}。与关怀方相对应,被关怀方也需要表现出一种感受能力,当关怀方关怀被关怀方时,被关怀方也能感受到自己被关怀,并能接受这种关怀,这就形成了二者之间的互为关怀的良性互动,使交往者之间融通自然,更易协调一致。

虽然吉利根和诺丁斯把关怀看作女性特有的道德的声音遭致了一定的质疑(如特朗托认为关怀是超越性别的),但女性在关怀伦理上的独特优势还是有目共睹的。与男性相比较,女性的关怀情结总体上确实优越于男性,而且关怀本身就是基于对女性一些特点考察而发展出来的,它强调女性的关怀和同情,是一种“女性”伦理学。这种“女性”伦理学与“女性意识”密切关联,它主要关注的是,由于女性的生育、抚养儿女、协调家庭关系等活动而形成的强烈的同情心、母爱等其独有的情感气质。因此,从女性的角度对关怀伦理的研究和挖掘就显得更为深刻。由于女性和男性在传统社会中在生活经验和体验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女性不仅很好地保有了原始的、自然的、朴实的自然关怀,例如,母亲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付出的母爱都是自然而然的,她不计利害得失甚至投入整个生命,这种关心爱护之情近乎一种生物本能,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女性还形成了丰富的伦理关怀。这种伦理关怀虽然以对自然关怀的感觉和记忆为基础,但它显然已经超出了本能,变成了以伦理为基础的自觉意识^{[6] P48)}。在诺丁斯看来,虽然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别,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通过生活经验所积累起来的伦理关怀总体上要比男性强烈。妇女通常比男人更多地负责关怀年幼的孩子、病

人和老人,而且她们还要照顾他人的需要,在一些社会状况下协调冲突,这需要有大量的自主、爱、选择以及交流的技巧。

女性在关怀能力方面还有另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当遇到各种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时,她们善于从关怀的角度出发来协调双方的关系,在冲突中耐心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东西,以谋求团结与和谐,而不是过分执着于孰对孰错(男人则不一样)。协调多是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而对话则是基于对他人的一种关怀关系,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种道德态度在交往关系中的生动体现。对话能够“帮助双方作出一个共同理解的决定,它也把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以便形成关怀中的反应关系,进而维持关怀关系”^{[6] [154]}。这种关怀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性别基础,尤其在管理和政治决策共识的形成上必然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女性在管理中擅长将特有的关怀和关爱运用其中,更能使员工感觉到企业有家的感觉,玖龙纸业的董事长张茵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企业领导者。她对待员工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亲切随和,除了物质上的奖励,她还十分关心员工的安全、生活质量等,使员工感受到其关怀备至,对企业也充满信心。在谈及自己的成功之道时,张茵说这与团队和团队精神是分不开的^[7]。在行政管理方面,女性也表现得很出色,由全国妇联、中华女子学院承担的课题项目,通过对中国女性高层次(厅局级以上)人才参政状况的数据分析,以及个案研究发现,优秀的女性领导者具备与男性一样的品格和能力,并且她们还具有很多自身的优良品质,如体贴、理解、包容,在工作中既表现出高水平的领导力,又体现出女性的关怀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8]。

女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伦理关怀,她们更多地从敬畏、理解、尊重自然的角度出发,来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像照顾儿童或病人那样,用自己的行动来保持与自然的亲密联系。因此,女性的环境决策能力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优于男性,这对男性主导下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决策模式会

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挪威前女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在担任环境事务大臣时,在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政绩。在任职首相期间,她还担任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在她的主持下,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经过3年多的努力,于1987年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认为只有通过改革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如今,这种发展理念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并被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中^[9]。在非洲,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成功将环境和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结合起来,领导“绿色林带”运动,率领妇女一起植树3000多万棵,以此唤醒人们对改善生存状况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在中国,很多女性也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热切关怀,并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保护。2015年3月初,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人们对雾霾、对环境污染的深切关注,有网民评价这是“一个资深记者的道义良心,一个普通母亲的社会责任”。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女性参与政治决策,切实推进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必将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认知优势——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启发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女性主义知识论的重要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代表人物哈丁认为,“立场”这一概念是妇女反对男权主义政治斗争的产物,其目标是使妇女所关切的事项,能够反映在公共政策和影响这些政策的科学研究之中。这种认识论主张,从妇女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从男性中心主义的概念和社会秩序出发,来提出和思考各种知识问题,为知识的生产等诸多知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的女性资源。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所具有的“社会性别优势”,著名的女性主义知识论学者哈丁、哈德萨克等,均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女性的立场和经验能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具体表现为:(1)对社会秩序来说,女性是有价值的“陌生人”;对统治体制来说,女性是有价值的局外人,她们被社会秩序和知识生产的设计

和管理排除在外。因此,重视女性的价值,对于正确理解社会秩序和知识生产是非常重要的。(2)女性所受的压迫使她们更愿意从受压迫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有利于揭示出那些离开这一角度就难以看到的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3)女性所进行的反压迫斗争,促进了为被压迫者服务的知识的形成。这是因为女性从她们的生活视角出发,不仅能看到社会更清晰、更完整的图像,也能看到传统的假设限制了我们对女性的生活及其历史的理解。例如,对女性性别化的劳动分工的研究,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如何以及为什么社会和文化现象采取了我们所看到的形式。(4)女性,尤其是女性研究者,是“局中的局外人”^{[10] [P51-52]}。在父权制文化中,“局中的局外人”的特殊位置更易于觉察到中心和边缘、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关系。

其次,女性的立场较少存有偏见。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哈丁认为,“用于科学研究的现有概念框架、方法、规则和程序,仅仅是从站在优势群体利益的立场上建立的。某个特定的边缘群体的立场,可以指出获得更少片面性和更少歪曲的概念框架、方法、规则和程序的途径”^[11]。在此意义上,她指出,从男性的生活开始的研究,由于忽视了其他立场的知识来源而以普遍真理的持有者自居,这种研究可能会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相比之下,从女性生活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则更少具有片面性和歪曲性,能获得更准确和合理的对世界的认识。

再次,女性立场更具客观性。在女性主义立场论者看来,女性视角更为合理、客观。哈德萨克认为,由于性别歧视的立场,男性看不见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真实关系。相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由于在坚持或辩护现状上没有类似的利益,她们更能产生更完整的而且不是荒谬的理解,也能提供一种揭示社会实在真理的优势立场”^{[10] [P53]}。换言之,因为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她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与男性有所不同,甚至是截然不同,从而能更好地发现男性所忽视和遮蔽的事物,以及揭示出男性对现实的歪曲。与此同时,女性在社会中的双重角色也

使其视角更为客观。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承担着责任的女性,对家庭的、个人的以及公共的、男性统治者的环境和话语都比较熟悉,“这种双重熟悉赋予了她们更优势的适应性和更广阔的理解力。她们相对于男性在经济、社会上的低劣地位,迫使她们学会说男人世界的公共语言,并在这个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之间进行调停,这种沟通与调停源自女性的一种基本能力,即在与他人的关联中,平衡自己的需要并满足共同的利益的谈判能力”^{[10] [P54]}。

总而言之,女性在认知上的这些优势对于正确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女性立场的介入能够使以往形成的一些偏见和歪曲理解得到改变或矫正。由于女性立场以及其他的边缘立场长期得不到重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选择性的,经过筛选的知识往往是从优势群体的生活出发,因而也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的认知模式是十分片面的,至少是不符合最大程度的客观性的。从弱势群体的经验出发进行研究,能够提供不同的概念图式,能增加获得客观性知识的可能性,更有利于揭示被传统的方法所遮蔽的关于社会和自然的真实关系。就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而言,女性立场的缺失不仅使其在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从属地位得以延续,也使得与女性密切相关的边缘群体的利益遭受不利影响。因为,男性作为优势群体在制定自己看来似乎非常合理的政策时,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男性中心主义观念出发,来规划弱势群体的生活。以女性的认知优势参与公共管理和决策,可以使边缘群体的需要和利益受到重视。具体说来,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变女性生活被决定的命运,同时也可以矫正一些公共决策中的偏差。另一方面,能够改善一些弱势群体的处境,因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要依靠妇女,包括女性活动所支持的儿童、其他家庭成员、老人、病人以及一些更大的社会群体。

四、结语

长久以来,尤其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女性被隔离于政治之外。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借助于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

相应的制度设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文化制度等),将女性范围于狭隘的私人领域,即便偶有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其地位也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女性被认为是智力薄弱者,无法胜任管理和决策工作,这种观念甚至变成了男女两性的共识,严重妨碍了女性对自身性别的合理认同,以及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对自己才能的充分展示。要打破这种性别歧视的观念,必须从女性性的优势特征出发,挖掘和彰显女性优越于男性的各种素质,为女性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政治生活提供充分的理论根据,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性别上的边缘地位。

女性作为人类性别的另一半,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价值创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忽视或轻视女性生活价值的观念都是不合理的,许多女性发挥性别优势、广泛参与公共生活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并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总之,女性的性别优势可以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男性不可能替代的积极作用,只要人类在制度、男性和女性的彼此认同上形成合理的共识,女性基于性别优势的参与社会管理和决策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M]. 曾振宇, 注说.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343.
- [2]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91.
- [3] [加]巴巴拉·阿内尔. 政治学与女性主义[M]. 郭夏娟,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 [4] 赵树勤. 女性文化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5] 骆晓戈. 女性学[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2013.
- [6] 肖巍. 女性主义伦理学[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 [7] 郭丽双. 女性管理学概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363.
- [8] 陈至立. 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3. 164.
- [9] 蒋莱. 女性领导力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32.
- [10] 魏开琼, 曹剑波. 女性主义知识论[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 [11] [美]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 夏侯炳, 谭兆民,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202.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Gender Advantage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ZUO Xing-ling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feminism is to pursu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in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 But as a result of long-term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ndrocentric ideology, women's gender advantages are obscure. Therefore, for equal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we must excavate women's gender advantages gradually. With the approach of gender analysis, I'll put forth a new interpretation about emotion and reason, public sphere and private sphe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rgues further that women's multidimensional performance of gender advantages in psychology, emotion and cogni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ir extensive and in-depth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gender analysis; care ethics;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责任编辑 鲁玉玲)